

三國志演義是我們民族歷史上的一部珍品。它的故事情

事和戰爭和各種地主階級提供了大量迷人的劇目。我國勞動人

民和知識分子通過歷史小說的故事和人物，人們一代一代

地把這一本書看作理解封建社會的政治和战争生活的一個窗口。

三國

歲

立皮

開三國

學而的

周

立皮

作于四百中是元明間人

京

北

出

社

已逾五百年。

這個長約七十五万字的巨制，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大规

模描绘封建王朝的各种矛盾的小说。它

安三

文学儀論
周立波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文学淺論

周立波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東單麻線胡同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發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 · 铅页: 2 · 字数: 84,000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1,000册

统一书号: 10071·403 定价: (6)0.40元

统一书号：10071·403

定 价：(6) 0.40元

(AG36/09)

目 录

生活、思想和形式.....	1
方言問題.....	8
回答青年写作者.....	14
談人物創造.....	20
答《文艺學習》問.....	25
致湖南青年文学創作者會議的賀信.....	28
紀念、回顧和展望.....	31
几个文学問題.....	35
談阿Q	41
略論魯迅先生的杂文.....	50
《民間故事》小引.....	56
《魯彥選集》序言.....	59
論《三国志演義》.....	64
讀《六十年的变迁》.....	72
蕭軍思想的分析.....	81

憤怒和警惕	91
清洗胡風	91
清算胡風这个壞家伙	93
憤怒和警惕	94
反党分子罗烽的一些言行	96
根源在哪里?	101
隱含的敌意	105
《暴風驟雨》是怎样写的?	109
《鐵水奔流》的創作	115
关于《山鄉巨變》答讀者問	120
后記	125

生活、思想和形式

近来使我思索最多的，是我們的生活和思想的問題。我們这些有点写作知識的人，都还能够适当地表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都还能够清清楚楚地說一点道理，講一个故事，有时說得很輕松，有时很沉重。但要提出时代的重要問題，写出广大的工农群众都能感到兴趣的生活，那就为难了。我們对于那样的生活不熟悉。我們是从旧世界里来的，还帶着許多思想上的毛病。

对于我们，立場的确定，思想的改造，是最要紧的事。我不同意这样的說法：“到生活中去，不但解决了艺术問題，也解决了思想問題。”事实不完全是这样的。我看到好些写文章的同志，到生活里去了，不但去了，而且現在也还在那里，但是他們的思想还是一样地迷糊，立場还是一样不明确。写不出东西，或者可以說，因为沒有思想的光輝的照耀，看不見生活里值得上書的东西。看不見，也就写不出，勉强写出来，就要生毛病，或者显得很空洞。

有人問，有了思想立場，是不是对于觀察现实、对于視野，有所限制呢？那要看是什么样子的思想。如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那就不会有限制。因为它和現實的情况和發展，是

一致的。有人說：“過去左聯，因為強調了思想立場，使得許多作家只能寫出一些公式主義的作品。”這話不合歷史的事實，而且如果說，左聯真有一些公式主義的作品，那也不能歸罪于思想立場的強調，應該說那些創作家和批評家的思想，還不純正，還有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成份、主觀主義的成份在裡面。公式主義是主觀主義在創作上的一種表現。

要明確地肯定我們的文學是為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服務的。這樣，我們才能有所擁護，有所反對，才能引導讀者走向一定的地方。不熱烈地參加政治鬥爭，這是自然主義的做法。不站穩立場，甚至于失掉立場，這是自由主義的表現。在我們中間，公開標榜這兩種主義的人是沒有的，但是很有這兩方面的傾向，特別是自由主義的傾向，顯得更多些。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我們都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身子參加了革命，心還留在自己階級的趣味里，不習慣，有時也不願意習慣工農的革命的面貌，這是一。其次，我們受了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文學的影響；這種文學是歌唱個人主義的，我們沒有分清楚，這種文學在當時有革命的作用，但是到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在，如果毫無批判地接過來，就要變成反動的東西。第三，我們上了當，沒落階級有時提倡假自由文學，標榜為藝術而藝術，來欺騙民眾，我們跟着也胡里胡塗的，不和鬥爭着的工農協同一致，努力去爭取民族的、階級的自由，却和自己的人來鬧個人的自由了。

這些都是思想上的大毛病，在這次整頓三風的運動中，我們要尋究這些毛病的原因，從而根絕它。我們文學工作者一定要把革命的旗子舉得更高些，要這樣才能創造很好的文學。我

們要站稳了立場，改造了自己的思想，才能写出好文章。我不同意把思想和艺术分开来看的說法。有人說，某某人的思想不正派，文章倒漂亮。沒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的思想不正派，文章也一定不好。从来没有怀着坏心眼、宣揚坏道理的好文章。心眼坏，道理坏，文章跟着坏。評論文章，决不能够离开內容，單就形式來說話。一只瓶子裝了葡萄酒，我們愛这酒，自然也兼爱瓶子，但这完全是因为裝酒的緣故。要是同一瓶子，裝的是污水，那我們就不但不爱它，而且远离它。文艺上的內容和形式的关系，大概也是这样子。文章的妙手，常常把內容和形式搞得很調和，使你响往于他的內容，也吟味着他的形式。但是分析到最后，还是內容起决定的作用。牽引我們的，总是那能使我們沉醉的醇酒，而不是瓶子。

因此，文章家千万不要拿着自己的瓶子裝污水。为这样，我們就要把心来扶正，就是改造思想，就是要不断地和自己的非無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就是要把自己的心的願望，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連結在一起。

思想改造了，就是写工农以外的人們的生活，对于革命，也有益处。我們如果熟悉一个資本家，一个大地主的生活，把他写出来，只要不違背工农革命的觀點，那也是好的。但要写积极的題材，写肯定的人物，那就除了改造思想以外，还要改变我們的生活。改造思想和改变生活实际上 是不可分开的。我們要到群众中去参加斗争。我們这些小資产阶级出身的人，离开群众斗争的生活太远了，太久了。我們的題材不是太瑣碎，就是太陈旧。时代变得快，創作不能配合时代的脉搏，这是一般人的議論，这議論是應該重視的。但在創作家这实在也是为

难的地方。一个聪明的作家不但不会去写他不熟悉的題材，而且不会去写那沒有打动自己的題材，因为那样一定会失敗。可是，为我們所熟悉，并且打动我們的，只是身边的生活，过去的經歷。我們身边有許多鷄，天天听慣了母鷄产后的啼叫。我們一年四季住在窯洞里，非常熟悉自己的沙鍋。我們还很会做梦，情書写得很漂亮。这都是生活，而且这里面也埋藏無数小小的心灵的悲喜，可以成为“意識之流”派的貴重的題材。可是这种属于个人的靜止的生活，和这动乱时代的大众的悲欢、掙扎，离开太远了。

我們中間另外有些人，过去参加过斗争，有一段光荣的经历。他們現在在写遙远过去的回忆，对于新的事件和新的人物不熟悉，也不留心。他們背着过去的包袱，并且停下脚步来，漸漸地也和这动乱时代的大众的悲欢、掙扎，离开得久了。

自然，写身边，写过去，也是可以的。只要立場站得稳，写出来也有教育的意义。但是这个战争的环境太艰苦、太緊張，群众要求更重要、更新鮮的作品，这是合理的。我們許多同志想去滿足这要求。他們到了前綫，到了工厂和农村。这比过着靜止的、回忆的生活好得多了，不过他們也沒有写出很多的动人的作品。这条走向群众的道路是对的，却又为什么写不出动人的东西呢？我想，这是因为这些同志去參觀了人家的生活，沒有亲自去参加。他們帶了鉛筆，帶了本子去，把一些碰到的景象，听來的故事，記在本子上，还抄了許多方言和諺語。但是他們忘記把一件重要的东西帶去，忘記把自己的心帶去。沒有印在心里的情景，只有抄在紙上的材料，写出东西来，自然不动人。

收集紙上的材料，对于写作，只有輔助作用。要緊的是帶了自己的心去，去參加工作和斗争。把工作的地方当作家庭，把群众当作亲人，和他們一同进退，一同悲喜，一同爱憎。要这样做，將來才能写出好作品。画家米勒說：“非多所知道，多所忘却，不能得佳作。”这是对的。把工作的地方当作家庭，把群众当作亲人，自己也成为他們中間的一个，一天天聚积着丰富的印象，尝味着人人的悲喜，这才算是做到了“多所知道”的功夫。知道多了，过一些时候，記得了最主要、最特征的一切，忘却了不重要和不必要的細节，这是“多所忘却”的意思。要是知道不多，那就只有兩条路好走：一条是把所有知道的通通写到紙上来，务必使得人人看了打瞌睡；一条路是把忘却做到“完蛋”的程度，不写东西，坚决做个空头文学家。

我們還沒有真正工农出身的作家。改造我們这些小資产阶级出身的人們，使大家的生活和思想，一天一天工农化，这是一件切实的要緊的事情。但是，改造了我們的生活和思想以后，是不是就能写出好作品？那还不一定。形式也應該講究。內容和形式的关系，上面談过了一些，这里簡單地談談我們的形式的毛病。

我們的文学，“五四”以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好影响居多，坏影响也有。在形式上，使得我們的作家有洋八股倾向，这是坏影响，我們還沒有独創的新形式。小說和詩，除了少数杰出的創作以外，大都是模仿代替了創造。文章做得和外国人一样，还自以为清新，我在过去，就有这样的毛病。現在也还有些很好的同志，写小說模仿契訶夫和莫泊桑，還沒有踏出自己的道路来。

有許多形式，外國很發達，我們不能不學習，不但現在要學習，將來也要的。但是學習決不是止于模，我們要添加自己的新的進去，這叫做創造。過去我在魯迅藝術學院教《名著選讀》，沒有着重地說明這一點。這是不對的。

過去我在魯迅藝術學院教《名著選讀》，選讀中國的東西太少了。這是偏向。我們小資產階級者，常常容易為異國情調所迷誤，看不起土香土色的東西。其實，土香土色的東西常常是好的。流傳在民間的古典小說，有無數優點。《紅樓夢》且不去說罷，就是產生較早的《西游記》，也是好書。作者幻想的能力，寫實的本領，都不下於西洋文學里的早期小說的作者。玉皇大帝的馬伕班長孙悟空，在民間的聲名，比阿Q還大。並且一直到今天，從孙悟空和豬八戒的對話里，我們還可以看出明代民間的生活。中國古典小說沒有踏進文人的文苑，因此也沒有走上廟堂，倒是能夠反映過去人民的生活。這一點，比唐朝以後的詩，宋朝以後的詞，元朝以後的曲子，還強得多。我們要繼承並發揚它的這一特點。

為了反對洋八股，繼承和發揚中國藝術的優點，是必要的，但也要看清楚它的毛病，而且同時繼續汲取外國文學的長處。

不過外國文學中的象徵主義、印象主義和“意識之流”等等，是要不得的。這些東西也曾傳進中國，給與我們的文學一些輕微的影響。這使我們的形式變得暗晦、小巧，而且很做作。這使我們許多作家離開了現實，專門去講求形式的精致和新奇。這是形式主義的傾向，我們要清洗這一種傾向。我們是為了說道理、寫生活，去尋找形式的，不是為了形式去尋找形式，換一句話說，是为了把我們的革命的道理講得更有說服性，把

我們的工农生活写得更能打动人，我們才去摸索好的形式的。我們怀着为革命的功利的眼光，去遍采中国的和外国的各种形式的長处，以便創造自己的新形式。我們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派，不是形式主义者。

1942年6月，延安。

方言問題

看了邢公曉和劉作驥兩先生的文章，我也想來湊湊熱鬧，談談我對這問題的看法。

兩位先生涉及的問題是很多的，本文不能一一談論，我只根據創作實踐的經驗，說些點點滴滴的感想。

就我所知，過去和現在，都沒有人正式提出“方言文學”的口號，也沒有人把這口號“作為對反動統治階級鬥爭的策略之一”而提出。自然，文學是對敵鬥爭的武器之一，但不是光指文字，主要指內容。文字，方言，是“我能往，寇亦能往”，敵我雙方都能利用的。同樣的方塊字，蔣介石集團用來譴反動的胡說，我們用來寫革命的文章，區別主要在內容，而在文字。“五四”時代，中國文字有過一次顯著的改革，那時候，用文言的多半是些守舊的，甚至反動的人物，用白話的是進步的、革命的勢力。但是不久，反動的統治階級，特別是蔣介石集團也用白話了，蔣幫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家都是用白話來創作的，但是他們這樣做，決不能、也沒有改變他們的反動的面貌和本質。這也說明了文學的革命與否的基本的標誌，不是文字，而是內容。

邢先生說：過去我們寫農民，用方言，都有革命的意義。

現在全國解放而且統一了，“特別是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後的今天”，似乎不能再用方言來創作，來寫農民了。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又說：“方言文學”這個口號“不是引導著我們向前看，而是引導著我們向後看的東西；不是引導著我們走向統一，而是引導著我們走向分裂的東西。”

前面說過，沒有人提出“方言文學”的口號，但我們過去會用方言來創作，來寫農民，將來也會用方言創作，也還是要寫農民的。至于用方言是否會引導著我們“向後看”，並且“走向分裂”呢？我以為不會。斯大林說得對：方言習慣語和通行語是全民語言的支脈，並且服從於全民語言。采用方言，不但不會和“民族的統一的語言”相衝突，而且可以使它語彙豐富，語法生動，使它更適宜於表現廣大人民的實際的生活。

邢先生又問：“在今天，我們是應該以正在發展中的統一的民族語言來創作呢？（那就是說在我們的創作中要適當地避開地方性土話）還是應該用方言來創作呢？（那就是說在我們的創作中特別去使用並且強調那些地方性的土話）”

我以為我們在創作中應該繼續採用各地的方言，繼續使用地方性的土話。要是不採用在人民的口头上天天反復使用的生動活潑的、適宜於表現實際生活的地方性的土話，我們的創作就不會精彩，而統一的民族語言也將不過是空談，或是只剩干巴巴的幾根筋。

在創作中怎樣採用方言的問題，是一個實際的問題。我們的文字是統一的。寫在紙上的漢文是全國一致的方塊字。而我們口說的方言却非常之多，非常之複雜。特別是南方，不但省和省之間的口音有重大的區別，有些交通不便的地區，縣和縣

之間的口音，也各不相同。但是，正如邢先生所說，北方話，特別是北京的方言，已有作为中國汉族標準語的趨勢。北方各省的話，大致都相同，懂得的人多，光有音，寫不出字來的詞，比較少。而南方話，特別是廣東、福建和浙江等地的部分的土音，在全國範圍內很不普遍。這幾個地方的有些方言，寫在紙上，叫外鄉人看了，有些近於外國話。這樣的方言，不宜全部的采用。魯迅和茅盾先生的創作，並不全部使用他們的家乡話，就是很好的例子。不過就是難懂的南方話，我們也應當汲取它的豐富的字彙，精妙的語句，來改進我們的語言。“像煞有介事”已經成了普通話。最初使用這話的時候，除了浙江一帶以外，懂得的人是很少的吧？但是現在，凡是能看書報的，都懂得它的意義了。北方土話普遍性很大。全國除了交通不便的地區，大都能懂得《紅樓夢》里的語言，其實這就是北京的方言。

在創作上，使用任何地方的方言土話，我們都得有所刪除，有所增益，換句話說：都得要經過洗煉。就是對待比較完美的北京的方言，也要這樣。採用某一地方的、不大普遍的方言，應當尽可能地不用在敘事里。寫對話時，書中人物是哪裏人，就用哪裏的話，這樣才能夠傳神。要是你所寫的是北京人，說上海話固然不行，說東北話也不大好。

用方言土話，一定要想方設法使讀者能懂。有些表現法，普通話里有，而且也生動，在敘事里就不必採用土話。有些字眼，普通話和方言里都是有的，只是字同音不同，那就應該使用普通話里的字眼。湖南人讀“還”如“偕”，讀“沒”如“冒”，寫的時候還是用“還”和“沒”，不必寫成“偕”和“冒”。方言里的太僻的字句，必要使用時，要反覆地多用幾次，讓人家从

上下文的語氣里自然而然地了解它的意義。東北話里的“牤子”，學名叫公牛，要是你把東北一個小豬倌的叫喊：“牤子吃庄稼哪”，寫成“公牛吃庄稼哪”，不但沒有東北味，而且人家還會說你是个書呆子，稱呼牛大哥也要叫它的學名。這說明了，在反映東北農村生活的文章里，有時有用“牤子”的完全的必要。當“牤子”這詞最初出現的時候，東北以外的讀者也許會不懂，但當你反覆地使用幾次以後，讀者就會自然而然地理解，這生疏的“牤子”原來就是我們認識的牛大哥在東北話里的別號。

毛主席指示我們說：人民的語言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方言土話正是各地人民天天使用的活的語言，從學校里出身的、脫離生產的知識分子，對於這種活的語言都不大熟悉。我國的語文有着長久的分離的歷史，就是現在的筆寫的白話和人民的口語，也還是有著顯著的差別。“學生腔”往往語彙貧乏，枯燥無味。比方紅的顏色，要是叫我們形容，就會說：很紅，通紅，紅得像火，或是紅得像胭脂，這樣的敘述當然也可以，讀者也都懂，但總缺乏新鮮的風趣。農民形容紅色的時候，就會說道：紅得像顆刺梅果，这就帶著新鮮的田園的風味。描寫斗嘴的雙方都很尖銳的情形，農民說是“針尖對麥芒”。針尖和麥芒，都是既尖且銳的，這是生動的形容。很少接觸“麥芒”的人，不大容易想到這樣好的話。

勞動的人們喜歡把生產過程中習見的具體的事物，用精煉的語言構成生動的形象，夾在談吐中，使得人們對於他們敘述的事情和行動，得到深刻的印象。這是人民的活的語言：方言土話的一個重要的特點。

方言土話的另一個特點是比較簡練。老百姓善于使用簡單